

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方克立

哲学与哲学史之间

——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郁有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 方克立

20 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哲学与哲学史之间

——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郁有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郁有学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5617-3730-0

I. 哲… II. 郁… III. 冯友兰(1895~1990)-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955 号

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著 者 郁有学
策划组稿 陈丽菲
责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4100

书 号 ISBN 7-5617-3730-0/B·206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	张岱年	任继愈	萧箴父	汤一介
主 编	方克立			
副 主 编	陈卫平(常务)	陈 来	郭齐勇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干春松	王中江	王炯华	刘岳兵
	乔清举	宋志明	李宗桂	李翔海
	杨国荣	何中华	郑大华	张天行
	张斌峰	胡伟希	赵剑英	赵德志
	高瑞泉	赖永海	谢遐龄	欧阳哲生

总 序

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20 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三次历史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纪之交,深入研究百年巨变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进步的本质,系统总结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 21 世纪新的奋进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分工协作来完成。其中,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的精神历程,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作一番系统的总结、反思和自我批判,是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全部文化又在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同步的,因此,20 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自然地也就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阶段性的基本标志。考虑到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还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可以大致地把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初到“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论战是这个时期哲学、文化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则是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对立互动的局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真正代表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不是别的,它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三阶段是从建国初到 70 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推动了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对它的简单化、教条化理解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这一时期,在台港地

区,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三民主义哲学、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当代新儒家和各种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潮都各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第四阶段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与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相结合,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表现出了新的蓬勃的发展生机。这二十年也是海峡两岸以及中外哲学与文化交流互动最活跃的时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无疑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在世纪之交以至21世纪初的十年、二十年内,我们固然需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作整体性的宏观审视和研究,弄清基本的学派分野,揭示其发展大势、规律和特点,总结出对后世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著作、思潮、学派、问题、论战等各个方面,有比较全面和具体、深入的了解,掌握基本的思想史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因此,相对于整体研究来说,扎实的个案研究可能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要写出一部成熟的、有深度的20世纪中国哲学史或思想文化史来,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空白还需要填补,尤其是关于后五十年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基础更加薄弱。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套丛书不着眼于宏观审视,而是拟就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

化思潮、学派、人物、著作、刊物、社团、问题、学说、论战、事件等一个一个具体课题,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个案研究,力求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有一定深度,基本上能把所涉及到的问题讲清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此,我们初拟了一百多个题目,如能通过大家的努力分工合作做出来,那就为总结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的工作,其价值自然会在新世纪的学术发展中显示出来。

在批判总结工作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学术立场、观点、方法的歧异问题。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当代新儒家都在做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清理、总结和回顾工作,由于学术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学者们不仅在总体上对前后两个五十年、对后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价有不同看法,而且在涉及到一些具体人物、著作、思想学说、论争的分析评价时,意见分歧尤大。在世纪之交出现一个批判总结的高潮,“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有思想的对立和交锋,亦可收互动互补之效,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本套丛书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和方法,来批判总结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积极参与世纪之交的思想互动,为推进中国学术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丛书是在几位中国哲学史界老前辈的指导下,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国内十个中国哲

学专业博士点中的中青年教授参加的编委会,他们分别联系的作者,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富有开拓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我们要求各位作者在详尽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述,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至于学术风格则不强求一律,可以各有特色,各尽其长。毋庸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书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本套丛书的出版任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方克立

2000年3月5日

全面评价冯友兰

(代序)

方克立

冯友兰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应该对他一生的哲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他的是非得失,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一个全面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包括总体评价和对其各个阶段学术思想的评价,包括对其哲学成就、政治态度、道德人格等各个方面的评价,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也就是紧密结合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和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进程,用发展的观点和历史进步的眼光来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因为冯友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所以全面评价就特别重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只从某一个角度、对其某一个阶段的工作,局部地单向度地去进行评价,都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冯友兰现象”。

我在青年时代写过几篇文章,和冯友兰先生讨论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即对传统哲学思想怎样继承、继承什么、用什么方法去继承的问题。我认为冯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主观上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想用来解决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但是,他的“新理学”理论和方法,虽然经过多次自我批判,在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放弃,有些东西在潜意识中甚至相当坚持。所以他在 1950 年代讲“抽象继承法”,在 1960 年代讲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抽象的“共相”。这似乎

很矛盾！冯先生解放后的哲学立场确实有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从“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转变到“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表示接受“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他晚年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回归倾向时也没有改变，一再说“理在事中”就是具体的共相。但是作为方法论，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共殊关系问题，在讲传统哲学概念、命题的“抽象意义”或“普遍性形式”时，又不能把“具体的共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贯彻到底。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冯先生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我认为指出这一矛盾还是很有必要的。

前年在台湾召开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发展”研讨会上，我又提交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台港学者对冯友兰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对他“道术多变”批评较多，有的批评相当尖锐，不仅表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地是进行道德谴责，甚至人身攻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从冯先生一生的工作来看，无疑地应该对他“阐旧邦以辅新命”，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所作的努力给予积极的正面的评价。我在那篇文章中，把冯友兰先生解放后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努力，看作是他终生致力中西哲学结合的一个新阶段。冯先生虽然一生“道术多变”，可以把他的思想分成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思想中也包含着一些矛盾，但他终生所致力，是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促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融合，坚持爱国立场而为“旧邦新命”服务。这才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冯先生的“大节”。季羨林先生说冯先生“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前一句话我是完全赞同的。在台湾的会上，我还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应该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和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出发，对冯友兰以及和他同样处境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以更多同情地了解，以更加宽容的态

度来对待他们的思想矛盾和“尴尬”。我记得台大邬昆如教授在那次大会总结发言时,特别肯定了这一点。这说明海峡两岸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待历史问题也能逐渐形成某些共识。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多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生前就有许多批评、辩难和讨论,如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杜国庠、陈家康、胡绳等人对“新理学”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驳难;1950年代大陆学术界关于哲学遗产继承方法等问题的讨论;1960年代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的讨论;港台学者对冯友兰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的尖锐批评;海内外学者对冯先生在“文革”中从尊孔转变为批孔立场的非议;以及对冯先生晚年发表的一些“非常可怪之论”的不同看法和评价等等。一个哲学家在生前就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评议和讨论,足见其影响之大。冯先生去世不过五年,“冯学”研究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站在不同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学者,对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道路自然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在目前仍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的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全面评价冯友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海内外学者一定会在如何评价冯友兰这个问题上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既不厚诬先哲,也不为其掩过饰非。

1950年代以后,港台海外学者对冯友兰先生多持批评的态度,其中尤以新儒家学者的批评最为尖锐、苛严。在早期,可以张君勱责冯的公开信为代表;到近年,评冯的文章逐渐增多,刘述先教授的《平心论冯友兰》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信写于1950年代初冯友兰参加土改工作、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之后,张在海外看到了,严厉指责其学术思想转变是以哲学为资生之具,而不以之为安心立命、身体力行的准则,是“将心看得太轻而将在外者看得太重”。刘文发表于1980年代大陆学术思开展现代新儒学研

究之后,针对大陆学者把冯友兰看作是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观点,坚决主张把冯排除在现代新儒家之外。大陆学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认为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既然是一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实,并且已经发生影响,就应该客观地衡量它在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史上的地位;冯先生解放后转变学术立场是另一回事。其实不只大陆学者,海外学者陈荣捷、杜维明等人都不否认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例如陈荣捷先生在1950年代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一书中,讲到现代儒学思潮时,就主要地评介了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唯识论新儒学”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新儒学”两派思想。思想史的基本史实是抹煞和否认不了的。我觉得刘教授的“平心而论”一文有欠平实公允,对冯友兰先生欠缺同情的理解,有些批评用辞过于挖苦,如“变形虫”、“无耻文人”、“四大无耻”等等;有些批评也过于武断,如说“他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认为冯先生解放后没有“任何正面的建树,有之只是负面的影响”等等。

对于冯友兰先生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这样一个思想史现象,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哲学立场上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这是不足为奇的。站在反共的政治立场、坚持新儒家的彻底唯心论哲学立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冯先生是倒退,甚至认为是堕落和背叛。而在冯先生看来,他抛弃“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接受“理在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则是从谬误向真理的转变。港台新儒家只是从道德人格上谴责他对新儒学的背离,而并没有从学理上评说他后来接受的“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有什么不对。过于强烈的情绪反应,说明新儒家虽然都是学术圈中人,然其政治立场和哲学的党性色彩还是十分鲜明的。新儒家中本来就有门派之争,相互间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牟宗三是陆王心学的现代传人,他认为只有他这派哲学才是代表历史运

动大方向的“彻底的唯心论”，而对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程朱派甚不以为然。他过去对冯氏就有所批评，1950年代以后对其转向唯物主义更是攻击之不遗余力，甚至在学术会议上公开骂冯友兰不懂中国哲学，指其哲学史著作为“脓包哲学”，“外皮明亮精光，挑破便是一团脓”。用这种学术的傲慢来污辱一代学术大师，实在是做得太过份了。

大陆学术界从1980年代中期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以来，也有少数学者强烈认同港台新儒学，对冯友兰先生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例如上海社科院的罗义俊先生，就坚持认为新儒家主要是一人格生命形态，凡新儒家必对儒学抱一宗教感情一超越信仰，此感情此信仰乃不可易者，如果没有或者改变了这种信仰和感情，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新儒家，“纵然研究儒学有成就也到不了新儒家的位格”。照此观点，他认为冯友兰和贺麟解放后已放弃新儒学立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前期在新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足论”，没有意义。这同刘述先等港台新儒家的看法是很接近的。

从上述学者对待冯友兰先生的态度，可以看出新儒家的宗派性、排他性很强，对于别的思想派别中的人很不宽容，对于像冯先生这样从新儒家阵容中走出来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从1950年代起就“鸣鼓而攻之”，一直攻到现在。在他们那里，历史都可以割断（冯、贺早年为发展现代新儒学所做的工作皆“不足论”），更何谈对冯、贺等人进行“全面评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那一代人，我相信后辈学者将会以更加平实的心态去进行审视和品评，因此有可能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我读了近年来一些港台海外学者写的评冯文章，包括内地一些朋友的文章后，更增加了这种信念。事实上，在港台海外学者中能够对冯先生持同情地了解的态度的人正在慢慢多起来，有的相当客观公正，研究也很有深度。这是冯学研究的一种积

极的健康的发展趋势。

对于冯友兰先生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自觉认同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大陆学者多持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一大进步。张岱年先生指出,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这样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哲学家,实行如此深刻的转变,而且是“主动的自觉的转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就拿冯友兰先生来说,他的哲学转变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在《新理学》理论体系中已“包含着转向唯物主义的内在契机”。蔡仲德先生指出,冯先生解放前已接受一些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在1930年代讲“新三统五德论”时就已初步表现出来。在《新事论》的文化观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同时,大陆学者又曾批评冯先生在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某些不彻底,指出他的“新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我认为这些批评许多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对冯先生的帮助;当然那些没有学术意义的政治批判则另当别论。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包括冯先生自己的文章和一些评冯文章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今天大家都能理解,不该责怪哪一个人。中国学术界应该共同来总结那段深刻的历史教训。

1980年代以后,关于冯友兰思想研究和讨论的文章逐渐多起来,特别是冯先生去世以后,冯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了对冯先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哲学思想的分别研究和评析之外,对于冯友兰一生哲学道路的总结和分期,对于冯先生晚年哲学思想的评价,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

蔡仲德先生提出了总结冯友兰哲学道路的三阶段论,即“实现自我”(解放前)——“失落自我”(1949—1978年)——“回归自

我”(1979—1990年)的思想历程。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一种思想分期法,认为冯先生的思想历程从大阶段来划分,还是应该分为解放前后两个阶段,后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前期实际上也可以再分阶段)。因为冯先生晚年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向旧哲学回归,不能说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回到“新理学”哲学体系,或者回到了19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来写的,这在他专门讲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全书绪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该书《自序》中也明确地说:“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部书是以“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写出来的,他在晚年也没有从“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倒退回去。“新编”和旧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冯先生晚年思想中又确实有某些回归现象,这种回归在写作《新编》时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在第七册中,这是不容否认的。陈来是冯先生晚年的助手,他“默默而观冯友兰”,对此颇能心领神会。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冯友兰思想的晚年回归现象,如《新儒家八大集·冯友兰集》的编者指出:“诚然‘新理学’论主的‘道术’在五十年代后多有‘迁变’,但至少,他的出版于1985年的自选集《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表明,他在他晚年又重新返回到大约半个世纪前的‘贞元六书’。他到晚年‘蓦然回首’,对既经‘迁变’的‘道术’再作贞认。”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认为冯先生晚年重新回到了“贞元六书”,“对既经‘迁变’的‘道术’再作贞认”的观点。冯先生的晚年回归,决不是全面回归新儒学,全面回归“贞元六书”,全面回归他前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而只能说是一程度地回归,部分地回归。冯先生说 he 晚年已经打通了儒释道,打通了中西哲学,因为

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应该把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吸收包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他说:“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个界限对我来说已经打通了。”他已经没有继承儒家道统、再回去当新儒家的意思,说他回归儒家已经没有意义。

对于冯友兰晚年的思想回归现象,应该做具体分析,哪些回归,哪些不回归,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他的一些“非常可怪之论”也不能笼统地一概名之曰“回归”。对于冯友兰晚年的思想回归现象,站在不同哲学立场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欢迎、赞同和欣赏的态度,也有批评或表示有所遗憾的态度;有热烈的十分肯定的评价,也有持相当保留态度的一分为二的评价。许多学者对冯先生经过风风雨雨,晚年表示不再依傍别人,要“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是欢迎的;对他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欢迎和肯定的;对他在宣称“打通了”人类文明一切好东西以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提倡和弘扬,比如对儒家人生境界说的坚持和提倡,也适当给予肯定,至少肯定这个研究方向是有意、有价值的;但是却对他在《新编》中所表述的某些观点,表示不赞成或者有保留,应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在对冯友兰晚年思想评价问题上,大陆学者和港台学者还会表现出一些思想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从她的认识立场出发,大力表彰冯友兰先生晚年“敢于突破马列教条,充分表现了义理之勇”,而我对冯先生在“新编”最后的结语《反思》中表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很不赞成,认为其所表现的“义理之勇”并不是都值得肯定的。相反,我认为冯先生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40年,最后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一个很大很深的误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冯先生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